

阐释与批判

刘士林

著

当代
文化消费中的
异化与危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金项目

“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
系列研究

山东文艺出版社

阐释与批判

刘士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 刘士林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系列研究)

ISBN 7-5329-1677-4

I. 阐… II. 刘… III. 文化生活-消费-研究 IV C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8430 号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2 插页 293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17.80 元

序言 斯宾格勒的大预言

高小康

斯宾格勒有句名言：“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这句话在我们探讨当代文化问题的时候显得更贴切。这不仅是说在当代文化形态中城市生活在整个文化生活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城市之外的乡村，文化生活、人们的精神需要和趣味也越来越向城市靠拢，甚至可以说乡村本身也在努力地使自己城市化。因此对于今天的文化研究来说，研究城市文化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研究整个当代文化的问题。反过来说，把当代文化的问题聚焦在城市文化这个视角上，将会使我们更容易发现这种文化形态的来龙去脉。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曾在一部书中把国家称作“巨怪”（Leviathan），其实城市也是只巨怪。城市从上古的部落、村镇、城堡中蝉蜕而出，逐渐地、越来越快地从周围抽取人口、资源，最终形成了与周围的、传统的文化差别非常大的城市文化。这种城市文化从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与其所依附的传统和环境之间拉开距离，

同时又反过来吸附和吞噬周围的文化,使自身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直到今天变成了整个文化的主导力量。城市文化何以具有这样强烈的发展冲动和潜力,有时令人觉得费解。

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介绍,一位女生物学家在丛林里跟踪观察大猩猩的生活 30 余年,在她的观察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大猩猩会把一根树枝上的叶子捋光,然后用它来捅白蚁窝,把白蚁从窝里拽出来吃掉。按照人们通行的定义,人是能够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生活资料生产的动物。但这位生物学家的观察表明,大猩猩也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生产。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人们关于“人”的定义有问题,还是应当把大猩猩也算作“人”?这个观察结果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人的发展是依赖于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生产,那么为什么大猩猩没有能够发展成像我们一样的人?如果生物果真像达尔文所说的那样按照同样的自然规律进化,那么为什么自从我们人类出现之后就再也没有产生其他的达到类似进化水平的“人”类?看来在生物发展的过程中起作用的并不仅仅是决定论的因果关系。尽管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制造工具的活动,然而能制造工具却并不等于就能发展到人的水平;很有可能是有些被视为突变的个别化因素推动着人制造工具的活动向更高水平发展,而不是像大猩猩那样停留在一定的程度;正是这些内在的、具有活力的因素决定着那些把人同非人的其他生物区分开来的偶然结果的出现。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与大猩猩的差别不是会不会制造工具的问题,也不是制造工具的能力与水平问题。真正的区别在于,大猩猩可以满足于捋树叶做棍子的工艺水平,而人却不行;人不会像大猩猩那样永远地或至少是长久地满足于有限的工具和有限的获得。大猩猩或其他动物在遇到超出自己生存能力的困难条件时,会遵循自然规律迁徙或被淘汰,人却不是这样。人的发展决不

简单地是外界条件逼迫的结果。“人”的真正意义在于他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动物。人的内在活力和发展的潜力驱使着他不断地演变、发展,不断地使自己从自身的体质、能力、精神和整个生存环境的各个方面扩展膨胀,不断地侵吞、征服周围的自然,即所谓“人化”自然,才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人类世界。

城市文化正是这种扩张、发展的一个物化的象征。城市永远不满足于自身的存在状态,总是在不断地向外延展、不断地侵吞周围的乡村、不断地吸引周围乃至更远处的物质和文化资源,使乡村和较小的城镇辐辏或依附于自己,直至最终吸收、同化到城市中去。城市文化因此而越来越膨胀扩张和变得多样化。从古代的雅典到今天的纽约,从春秋时代的临淄到今天的上海,整个文化发展的历史从物质形态方面来看,就是城市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城市功能越来越多样化、城市生活越来越丰富和具有吸引力的过程。文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就是城市文化的发展。城市文化在发展中显示出来的那种内在的活力和扩张性,其实是人类文化本性的一个集中展现。所以斯宾格勒才说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

那么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城市这个巨怪究竟是什么?从构成“城市”这个词的各个词素本义来看,“城”就是城墙,也就是一整套地理性的、永久性的区域防御体系;“市”就是市集,就是居民进行集中贸易活动的场所。合起来看,“城市”是一个相对封闭起来的供人们居住生活的环境。这正是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古典城市的基本功能和形态特征。但这个特征显然不符合现代那些从古代城墙外围远远扩展出去或者干脆就没有任何封闭限制的城市。封闭性不过是古典城市的一个历史性的特征而不是城市的本质。城市的本质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与上面所提到的文化特点相关的生活方式——平民性、商业性、高度的资源耗散结构、发达的物资与信

息交流网络、公众化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等等,这一切特征都体现出城市的内在活力和发展潜力,正是这种种生活方式中所蕴含着的内在活力和发展、扩张的潜力才是城市的本质。一位城市建筑学家在谈到现代城市中人际关系特点时这样说道:

在传统的社会中,如果我们请一个人谈谈他的亲密朋友,然后再请他的朋友一个个地谈谈自己的亲密朋友,他们就会互相指出对方是朋友,形成一个亲密的群体。一个村庄就是由这样的几个群体构成的。

但今天的社会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如果请一个人谈谈他的朋友,然后再请他的朋友一个个谈谈自己的朋友,他们说的就完全是不同的人了,对第一个人来讲,也许完全是陌生的;而且那些朋友的朋友,还会说出另外一些人是自己的朋友——这样,圈子就会越来越大。事实上,现代社会中不存在亲密无间的群体,今天的社会呈现出交错重合的人际关系——亲朋好友的交往圈子构成了一个半网络系统,而不是树形系统。

在这种关于城市社会关系的分析中使我们可以看出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网络性——城市社会,尤其是现代城市社会中不存在亲密无间的群体,而只是由熟悉的朋友和不熟悉的所谓朋友的朋友混合构成的社会交际网络。在这样的网络关系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城市特有的半开放性:既是相互联系、依存的,又是陌生、分离的。城市文化的活力和扩张性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人际关系有关,因为在这种网络关系中人们的生活内容较开放丰富而较少封闭和保守性,个人的行为更多地与整个城市社会相关而不是只与少数亲朋好友相关,所以比较容易培养起个人对公众事务的兴趣和社会责任感。

研究城市文化的特性及其发展,可以从很多角度入手,而城市

市民的文艺活动不仅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方面。因为整个城市社会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而言,不仅仅是直接相关的物质性存在——实际上个人与社会的直接相关性是非常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城市是每一个市民生活的背景和话语的“语境”(Context),是每一个市民生活中有意无意地以之为根据的活动基础。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虚”的关系从整体上来说就是一个城市的“形象”——存在于每一个市民的意识或潜意识之中,而且也影响到城市之外的其他文化环境中人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城市中人们的看法的感觉、印象和评价的整体。一个城市形象的形成当然是以整个城市的物质条件与发展为基础的,然而却是通过城市的文艺活动表现出来的——城市形象的视觉外观是通过城市规划和建筑艺术体现的,城市形象的文化内涵是通过市民的艺术趣味和教养体现出来的。整个城市在周围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给世界造成的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城市艺术的传播和城市的传播艺术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城市文化的特征,首先就应当研究城市的文艺活动,研究城市艺术的特点、发展和对整个城市文化的形成与城市形象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古雅典的半圆形剧场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古罗马的竞技场和斯巴达克的拼死角斗、宋代东京的勾栏瓦舍和街头的说话艺人、现代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和小酒馆里喝得醉醺醺的前卫艺术家,还有当今中国大小城市里的种种艺术景观,如北京城里王朔笔下的“顽主”和街头扭秧歌的老太太、上海浦东的新潮建筑和怀旧的“老克腊”、文化古城中追赶时髦的小市民时尚……如此等等都是城市文化和城市形象的典型体现。研究这些城市艺术就是在研究当代城市、研究走进21世纪的文化。“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反过来说城市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

当我说城市是一个“巨怪”的时候,不仅仅是在表达我对城市

文化发展得如此强大、如此有活力而感到的惊奇,而且更是在表达我对这个巨怪的发展前景所感到的一些困惑和忧虑:谁也不可能阻止城市文化的发展,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城市文化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一样,都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过度的发展将无可避免地带来城市生存的危机,而寻求一种合理的、平衡的发展却从根本上来讲是违反城市文化本性的:城市文化不是根据人们的意志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内在活力和冲动的产物,它可能依照人们的意志限制发展吗?斯宾格勒在一个世纪以前断言现代都市文明的发展已经到了它的冬季,似乎在预言它的毁灭。按照他的有机论历史观,大都市像巴比伦、亚历山大里亚、罗马、拜占庭等,都遵循着有机体发展的规律,生长、繁荣到衰老、死亡,当今的城市也不能免此劫数,发展昌盛之后的毁灭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大都市(至少在中国)非但没有毁灭,似乎还在继续演变发展——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大都市,北京从一个文化古城变成了万物皆备于我的超级大都会,上海正在与香港这样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较量高低,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城市在努力使自己跻身于国际化大都市的行列……这种发展趋势将中国推进了 21 世纪,但它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似乎还难以遽断。斯宾格勒的预言究竟是不是个经验主义的错误,还有待历史来验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对今天的文化学者来说,观察、理解和分析当代都市文明发展的态势,比简单地赞美或批判它更为重要。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项目《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就是从文艺活动的角度研究当代城市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包括一系列研究专著:作为阶段性成果的有《狂欢世纪——娱乐文化与当代生活方式》(高小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最终成果是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丛书,包括《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高小康著)、《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刘士林著)、《喧哗与萧条——当代城市中文艺的传播与教育》(高小康主编)三部。这一系列研究对于当代文化研究工作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但也是一个极有意义、极富挑战性和实践性的课题。这些研究成果或许还不尽成熟、不够深入,但希望能够借此来引起更多的研究者和文化工作者对文艺与城市文化关系问题的关注,这对处在一个新世纪开端的中国文化发展来说会有积极的意义。

目 录

序 言 斯宾格勒的大预言·····	高小康(1)
绪 论 策划的时代·····	(1)
第一章 背井离乡 ·····	(44)
第二章 半推半就 ·····	(99)
第三章 赤身裸体·····	(151)
第四章 废画连篇·····	(211)
第五章 实物交换·····	(265)
第六章 马铃薯之诗·····	(319)
结 语 苍老的牛虻·····	(372)
后 记·····	(392)

绪论 策划的时代

人是什么？几乎所有关于生活的沉思，最终都要归结到这样一个简单的疑问之中。是的，这就是人类永恒的秘密所在。对其解答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但无论如何人们总会遇到一种苏格拉底式的麻烦：

告诉我，苏格拉底，我们应当认为你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如果你是认真的，并且你说的是真的，那么，这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的人类生活完全是颠倒的，而且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与我们似乎应当做的恰好相反？^①

这仿佛就是思想者的宿命。如何摆脱这样一种悖论呢？在经

^① [美]特伦斯·欧文著，覃方明译：《古典思想》，辽宁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2—83页。

历了中国古典哲学发蒙、西方现代哲学洗礼和我们时代种种风雨之后,我渐渐习惯了把它分成这样三个层次来理解。其一,人是怎样成为人的?其二,在世的沉沦与解脱;其三,在克服异化的过程中,如何使人不失为人?关于第一个问题,从精神发生的角度,人是在与其生理本体的分裂中成其自身的。它主要有这样两种方式:一是西方文明借助突出理性本体的外向型成人方式;二是中国文明借助突出伦理本体的内向型成人方式。由于在人的世界中树立了一种自然界闻所未闻的精神实体,凭借理念、仁等这些古典主义的精神核心要素,人类从此彻底站起来了。从历史角度来讲,这个问题于轴心时代(公元前 800 年—公元前 200 年)在人类社会中就已基本完成。而第二个问题则一直是轴心时代以来的文明历史中最为重要的精神问题。这是因为无论理性主体还是伦理主体,在本质上都是人对象化为物,变成与其本身相对立的、异己的东西。这种生成过程中人与自身的分裂,也就必然要产生种种现代主义的核心精神要素,诸如焦虑、孤独、心理创伤与人格畸变。这就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所揭示的此在的沉沦问题的严重性;同时这种人的精神现状,也就使我们现在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精神要素,诸如平面化、深度消失、耗尽、零散化等的产生,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在实质上,它们正是要解答我所谓的第三个问题的前一部分,即:如何克服人在其自身再生产中的异化问题。但是很显然,它虽然在克服人的理性或伦理性异化中颇有成绩,却并没有实现“如何使人不失为人”这一根本目的。所以在当代文化发展中,人们难免再次碰到这一疑难问题:“我们的人类生活完全是颠倒的,而且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与我们似乎应当做的恰好相反?”

由此引申开去,上述三个问题,恰好又是人类三个历史阶段的象征。对这里所讲的三大时代进行精神分析,它们与我在《文明精

神结构论》一书中讲的人类精神三期追求正相一致。古典主义的最高理念是“善”；现代主义的最高理念是“真”；而后现代主义的中心原则是“美”。古典主义为把人类同自然区别开来，而格外强调人自身的理性能力，把它凌驾于自然之上，它所走的是一条崇高的“主观唯心主义”之路；而现代主义为了论证自然界中“人的本质”，为了把自然论证成为人性的一部分，则刻意揭示人与自然的血脉关联，从达尔文到弗洛伊德都是如此，其所走的正是一条“客观唯心主义”之路；前者突出了人的伦理本体，后者则突出了人的知识本体。不管其现实的构建方式为何，由于从根本上树立起一个自然中“本无”的精神主体，所以它们在给生命带来极度荣耀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度的伤害。伦理本体的“成人”仪式是戴上道德的手铐脚镣；知识本体虽打碎了这种束缚形式，但又给心灵、想象力披戴上理性的枷锁，即在这样两种传统的“成人”仪式中，所成就的都已非那个故有的自我。为了报复这样一种人自身片面的、异化的再生产方式，于是后现代主义既抛弃“善”，也抛弃了“真”，从而真正进入一个非精神的感性时代。由此看来，从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换，只是人的精神理念的变化，是从追求“善”到追求“真”的转变，而其对人的精神本体之肯定则相同。所以，它远没有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换剧烈，因为在后现代文化中，人本身已经“死”了，人赖以“成人”、作为人的根本性标志的“主体性结构”彻底崩溃，在以批判与消解主体性历史结构为基本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洪流中，人的身体性成为一切文化活动的中心。本书正是从这种历史的“精神特征”角度来理解当代文化的现实结构。以现代主义为中轴，就可以把人的历史分为两大结构，即有本质的时代与无本质的时代。其中现代主义既是古典主义的极端发展，又是它的终结处；另一方面，它又直接导致了后现代主义的发生，后者正是前者走向了极端。由于现代主义自身很难彻底独立出来，所以为了行

文方便,在本书中以“人的本质”为尺度,把人类精神史一分为二,把“人之生”的时代称为古典时代,而把“人之死”的时代称为现代时期。

在以后现代主义为精神特征的现代时期,从逻辑上讲,作为对人的理性异化方式的反拨,自有其发生的必然性。但是问题在于,如脱缰野马一样的“现代”肉身,不仅不是人的最后目的,它同样也是一种更深刻的异化形式,即使人异化于人的生理性、野蛮性。如果说古典文化的精神追求所实现的是使“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那么同样可以说现代文化的精神追求则是使“人的动物性东西重新成为动物的东西”。而其发展到极端则泯灭一切物我、真假、善恶之别,人性本身也就彻底丧失了任何意义。因此,关于人的第三个方面,即“在克服异化的过程中,如何使人不失为人?”在后现代主义这里不仅没能实现,甚至连实现的所有可能性都取消了。因此,如何在克服异化同时,把人再生产为人自身,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遮蔽中,也就变得分外重要起来。人生最深刻的带有悖论性质的悲剧正在于:没有理性或伦理性的异化,人就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人;而没有对理性或伦理性的反抗,人就不可能成为自由的人。前者是把人生产为对象,后者则是把对象化的人再生产为人本身。这正是人生最深刻的矛盾之处,而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才有可能在人类历史中产生出具有自由本质的新生命。

从某种角度来说,“使人不失为人”,即不丧失其自由的生命精神。异化于对象(无论这对象是理性人还是道德人)固然痛苦,但在解除异化中如果把人性连根拔起,那与人类的历史生成自然更是背道而驰。就这一问题的现代性角度而言,后现代思潮的出现,实则与精神生产系统自身的关系更为密切。从精神再生产主要以文化消费为生产方式来看,当代文化中这种强大的身体性潮流,与当代的大众文化市场中的生产/消费活动直接相关。因为当代人

正是在当代文化生产/消费活动中,才被生产为以“身体”而不是以“精神”为主体的后现代主义者。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正此之谓也。因此,不管要解答“在克服异化的过程中,如何使人不失为人”,还是想弄明白为什么当代人一旦寻求自由,希望解放,就会上演一种非“人”化的、小丑般的闹剧,都必须回到人自身的精神生产/消费过程中去,亦即回到作为人的文化生产/消费问题根源的艺术生产/创造机制中去。

关于当代文化生产/消费活动在当代人生命结构中的作用,也是普遍被注意到的一个现实问题。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首先,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本世纪 60 年代所遇到的痛苦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对立依然存在,政治法律上的统治关系、经济生产上的剥削关系、文化教育上的不平等关系依然存在,但是,我们曾经有过巴黎革命与十月革命光荣传统的工人阶级怎么了?他们变得低眉顺眼,不再有满腔热血,不再高举解放全人类的战旗,摇身一变与其有着血海深仇的冤家握手言和。而综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从中可以提炼出这样一个核心概念:美学意识形态。美学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不同,后者在人自身的精神再生产中,所采用的生产关系是他律的与强制性的资产阶级专政,其手段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诸如军警、马鞭、高压水笼头、监狱、酷刑等等;而美学意识形态所采用的生产关系则是半自律的与感情化的,它所采用的手段,也变成诸如提高工资、改善生产环境、减轻劳动强度、完善社会福利体制、发展大众文化等等。一言以蔽之,资产阶级通过其手中掌握的文化机构、宣传媒介以及教育系统,把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转换成为一种具有共通性的美学系统;把难以被个体所接受的权力话语,转换成为一种人们自愿接受的情感话语。就在这样一种技术性的操作之中,它改变了人的本体存在,从而使所谓